烟台故事·朴学大师郝懿行⑥

一位乾嘉学者的学术自省

——郝懿行在科举洪流里的精神突围

孙明浩

乾嘉年间的风，吹过江南的烟雨，也吹打着山东栖霞郝氏望家族的窗棂。那是一个奇特时代：苏州惠栋高擎汉学“实事求是”的旗帜，力扫宋明理学空疏之弊；徽州戴震提出“由字通词”，试图以训诂考据重新通达圣贤之道。一时间，朴学成为学界主流。然而，科场衡文依旧以朱子义理为根本，八股文的起承转合，依旧是万千士子必须跨越的独木桥。这种“学术”与“仕途”的剧烈撕扯，给每一位士子都留下一道隐秘的伤口。对于好学上进的栖霞青年郝懿行来说，同样需要做出人生抉择。面对“八股取士”的功利诱惑，郝懿行并未随波逐流，他以耕读传家为锚，将丧乱之苦转化为治学的不竭动力，在胶东屋脊筑起一道坚实的朴学壁垒。

一、丧乱中的振作与新生
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的秋天，二十三岁的郝懿行远赴济南参加乡试。归来时，长女的出生为他带来了初为人父的喜悦，他为女儿取名“桂”，暗合乡试“桂榜”高中之意，寄托着对科场顺遂的美好期许。然而，现实是残酷的，此次科考他名落孙山。

科场失利的沮丧尚未完全消散，家庭的厄运便接踵而至。两年后，岳母染病去世，妻子林氏因伤心过度罹患恶疾，日渐消瘦，常年汤药不离口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二十八岁的郝懿行迎来次子毓麟的降生，这份喜悦成为多舛命运中的一抹慰藉，奈何婴儿出生仅十二日便不幸夭折。林氏本就羸弱的身体经此丧子重创，病情愈发沉重；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六月，林氏离世，郝懿行创作《悼亡诗》三十首，寄托哀思。

槐黄眼看火云流，深锁空闺止独愁。
背地沉吟灯畔语，不关宋玉好悲秋。
矮几铜瓶插几枝，绕栏亲摘叶参差。
石榴花色惊憔悴，从此小园不再窥。
无穷心绪藕中丝，铭笔深惭庾信词。
最是恼人长短句，黄昏风雨画帘垂。

丧妻、丧子、落第的多重打击，让郝懿行一度陷入“独坐萧斋唤奈何”的绝境。但他并未沉沦，埋首训诂考据之学，以“晨昏伏案，手不释卷”的苦读消解悲愁。正是这份在丧妻之痛中淬炼出的治学定力，支撑着他于悲恸中振作精神，决意以满腹经纶奔赴一场关乎实学信念的严峻考验。

在经历家庭变故后，郝懿行于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的“丙午决科”中厚积薄发，尽显实学本色，被崇尚实学的山东学政赵佑拔为第一，誉之为“齐鲁冠”，并按制以优贡生身份送入国子监深造——这一身份不仅是对他坚守实学之路的重要认可，更成为他日后进入全国性学术圈层的关键契机。

然而，学术上的荣光并未能驱散生活中的阴霾。正当郝懿行沉浸在决科夺魁的振奋中，新的家庭变故又至。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春，郝懿行怜爱的幼弟懿徽不幸夭折，家庭的伤痛再次袭来。同年，他以优贡生身份参加丁未选拔考试，虽最终未中，但此次京城之行让他得以结识不少志同道合的学者，极大开阔了学术视野。一场意料之外的缘分也悄然降临，丧偶许久的郝懿行与福山才女王照圆结为伉俪。

王照圆，字婉佺，时年二十五岁，出身福山古现王氏望族。其家族自明初迁居，文脉昌盛，清代涌现出包括尚书、巡抚在内的众多名臣巨儒，晚清甲骨学大家王懿荣亦出此族。王照圆虽六岁丧父，但在母亲林孺人“针黹之暇，课令读父书”的严苛教诲下，自幼博通经史，十余岁即能研读《毛诗》《左传》并作批注，才名早著。她不仅工诗文，更具深厚的经学素养，尤精《诗经》训诂与名物考辨，其学识才情，在齐鲁闺秀中堪称翘楚。

这场婚姻，本质上是两个重视学问的家庭在精神层面的相互认可与结合。对郝懿行而言，他迎娶的不仅是一位生活伴侣，更是一位在智识上足以与他平等对话、能够在朴学道路上相互扶持、疑义共析的同行者。婚后，二人“以经籍为伴侣，以考据为乐事”，相互扶持钻研学问。光绪五年《栖霞县志》记载：

（郝懿行）其夫人王氏，亦著作才，析疑辨难，如师如友，广见博闻，著作宏富。

这种“析疑辨难，如师如友”的治学场景，正是二人学术共鸣与情感契合的生动写照。在王照圆的勉励与协助下，郝懿行重新鼓起勇气，再次投身仕途科考。

二、书衣叙里的沉痛与觉醒

身处科举功名的时代洪流，郝懿行不得不将少年时光交付时文的研习，七岁入家塾日诵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十三岁从师专攻时文、日诵一篇，十六岁为应童子试而学作八股，十九岁补县学生员，二十二岁食廪饩，人生轨迹一度完全纳入传统科举轨道。这段被时文填满的青春岁月，也成为他日后反复叩问、深刻反思科举流弊的痛彻回忆。

在其内心最深处，对科举浮华之风的疏离与对经史实学的痴迷，始终如潜流般未曾断绝。郝懿行始终笃信，治学之本在于根究经史，故而直言：“不攻经史诸书，非治学之道。”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夏天，一桩寻常家事，触发了他积郁多年的学术思考。当时他自京城归乡，遵父命为家藏古籍缝制粗布书衣。诸事既毕，面对得以妥善护藏的典籍，他触景生情，“偶忆余平日之所感者，因援笔而为叙”，写下《新制书衣叙》一文。这篇由琐事生发的文章，实则是他少年治学反思的集中迸发，更是一篇昭示实学追求的学术宣言，在文中，他对自己二十余年的举业人生，完成了一场沉痛、真诚的自我解剖。

在自述中，郝懿行对功利化应试教育的批判，绝非空泛指责，而是深深根植于自身蹉跎的青春、治学偏颇的遗憾，是带着生命痛感与真切悔意的自我审视。他由自身经历延伸至时代乱象，对彼时山东乃至全国“重时文、轻经史、逐功名、薄实学”的功利教育生态，展开了全面、深刻且犀利的系统性批判。在这场自我剖白与时风批判后，那个被动顺应科举潮流的青年士子，逐渐褪去世俗底色，显露出日后秉持“实事求是”朴学精神、卓然独立的学者雏形。

针对山东地方教育，郝懿行直陈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急功近利的“速化”之风。乡里教学不求深耕经典，唯以“速化”为能事。天资稍佳者侥幸登科，学识空疏却自诩名儒；资质平庸者揣摩时文、投机取巧，亦侥幸博取功名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功利学风形成恶性循环：父兄凭借时文获利登仕，便将应试时文奉为传家法宝，代代沿袭效仿，反而将经史大典束之高阁、任由虫蛀，唯恐子弟潜心经典耽误举业。

郝懿行进一步剖析其深层危害，认为应试教育耗费士人毕生精力、消磨天资才情，使人自束发受书之初便唯功名是逐、心性苟且、本末倒置。此种风气培育出的士人，治学无根、立身无骨，他日步入朝堂，必然趋炎附势、依阿取容、丧失风骨，世风士德的败坏、士林气节的沉沦，根源正在于这种重科举、轻实学、重功利、轻修身的畸形教育模式。

可贵的是，郝懿行的学术思考不止于“破”，更重在“立”。他提出了“学求心得”的正向治学理念与教育纲领，试图矫正世俗偏颇：

夫学求心得而已，非必屏举业，薄功名，然亦曰得之不得，曰有命而已。故余尝谓教弟子者，准欧阳公读书之法，自七八岁始，不过十五六岁，大约诸经已读毕，然后出其绪余，文亦易工，处为通儒，出为名臣。此之所得视彼何如耶？余数年来持此教弟子之法，而自顾卑贱，不能冀俗之因余言而改也，且奈之何哉？

郝懿行并不偏激否定科举功名，他主张本末有序、学仕兼顾：少年当先沉潜经史、夯实学识根基、探求经典义理，待学有根基、见识通透，再研习时文、打磨制艺、应对科举。如此治学，既能成就有本之学、涵养士人风骨，亦可从容应试、立身济世，达成“处为通儒，出为名臣”的理想格局。

三、寒乡僻壤的思潮共振

郝懿行这份源于自身困顿、发自本心的学术自省，不仅是其个人治学理念的自觉革新，更是乾嘉朴学“崇实黜虚”精神下沉基层、观照教化的重要体现，为其一生“以实学立身、以经义驭举业”的学仕调适之路筑牢了思想根基。

依托《新制书衣叙》中完整的自我剖白与时风批判，郝懿行的教育反思跳出乡隅一地的个人感慨，形成与乾嘉主流学术思潮呼应的时代思考。坎坷半生的底层见闻与切身治学体验，更赋予其理论独有的现实底色。

其主张与乾嘉考据学“崇实黜虚”核心精神同频。郝懿行对“囚锁经史”、专攻“剿袭时文”之抨击，对“学求心得”、先通经史之倡导，将“崇实”精神由学术研究，贯彻至对基础教育根本路径之思，乃朴学精神于社会教化层面之强烈呼声。

这一批判思想与清代中期科举反思思潮呼应，与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中对科举弊端的讽刺大体同时。与郝懿行同时代的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》中从学理批判科举使人“不知本原”，郝懿行则以“经史类怪物”之沉痛描述，与章学诚之批判异曲同工，揭示了科举制度下真才实学与应试技巧、学问本真与功利诉求之根本对立。

较之戴震、章学诚等更多从事理论建构之学者，郝懿行之观察源于“寒乡僻壤”之鲜活现场与自身“随俗波靡、浮沉几二十年”之切肤痛，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。其笔下父兄以“速化”为教、将经史“囚锁”之细节，具有鲜明的现场感与现实针对性。此份批判，遂成乾嘉学术反思潮流中一份根植基层士人治学实践，具备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与实践价值的关键证言。

郝懿行是清醒的，他精准诊断教育功利化导致的学问根基塌陷与士人精神萎靡。他又同样身处这一“困境”之中，作为传统士人，他批判“剿袭时文”，却不得不为“博巍科”而研时文；深知科举之弊，却仍需在此赛道寻立身之所。

郝懿行《新制书衣叙》中的思考，是其个人困厄中淬炼的学术定力与时代思潮激荡之结晶。它将乾嘉实学精神化为对基础教育根基之深沉叩问，揭示了帝制晚期一位真挚学者如何于时代结构性矛盾中，在批判、妥协与坚守之夹缝里，艰难守护学术尊严与思想独立。这份精神遗产，使其人其思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，成为窥探乾嘉学术生态与士人心灵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。

欢迎原创佳作，投稿邮箱：
ytwbytj@126.com
欢迎关注「烟台街 V」